

关于政治成本影响企业 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



河南财经学院 乔永波 闫予磊 王 宾

【摘要】 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分析表明,Watts和Zimmerman所提出的政治成本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我国企业的相关会计数据并不能证实它。西方国家很多实证研究证实了政治成本假设的合理性,而在我国这些假设却得不到验证,这是不是和社会制度有一定的联系呢?本文从分析我国社会制度入手,具体研究了我国企业的政府管制,提出了我们的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

【关键词】 会计政策 政治成本 实证研究

自Gordon第一个提出公司经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有经济动机的观点以来,已涌现了大量的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检验的文献,这些文献对公司管理人员选择特定的会计政策形成会计报表的经济动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Gordon对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的经济动机进行了规范研究,认为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能在各期平滑盈余。但Ball和Sunder却有不同看法,他们指出:就整个市场而言,对于因会计政策不同而造成的盈余差异,投资者是能作出调整的。这一结果与有效市场假说是一致的,这说明经理人员可能不是为了平滑盈余或使盈余呈现增长趋势而选择会计政策的。

Watts和Zimmerman根据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提出了三大假设:①补偿计划假设;②债务契约假设;③政治成本假设。不少西方学者利用某一特定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对上述三大假设进行了检验:Dyckman和Smith对石油天然气公司油井勘探成本核算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实证结果证实了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在石油天然气公司是成立的。Daley和vigeland对研究开发费用是否资本化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结果与补偿计划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吻合。Dhalwal和Smith对折旧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结果与三大假设吻合。Hagerman和Zmijewski对存货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结果与分红计划假设不一致,但与政治成本假设一致。Hagerman和Zmijewski率先利用一些特定会计政策(折旧政策、存货政策、养老金成本的摊销政策以及投资税减免政策)的组合选择问题,对三大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也为三大假设的成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我国会计学者借鉴其研究成果分析了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譬如王跃堂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等,但令我们惊奇的是我国会计数据并不支持“三大假设”。中西方企业资料数据 displays了“三大假设”的不一致性。我们相信“三大假设”的充分合理性,但是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为什么Watts和Zimmerman的“三大假设”基于西方数据就可以

得到证明,而利用中国数据却不成立?中西方数据的产生过程一定存在着明显不同,以至于影响了理论的一致性。从总体来看,我国与西方最明显的不同是社会制度。那么是不是社会制度影响了“假设”的实证结果呢?有没有其他假设?如果有其他假设,能否得到实证的检验?这些是需要我们回答的。为此,本文分四个部分进行探讨:

第一部分阐述实证会计理论的产生基础及对“三大假设”的回顾;第二部分对我国的社会制度进行经济分析及研究设计,通过从经济角度分析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发现与西方不同的政府管制理论,进一步引出我们对政治活动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设计;第三部分进行实证研究与解释;第四部分得出结论。我们认为本文的研究对政府制定会计准则具有现实意义。

一、实证会计理论及其“三大假设”回顾

20世纪50年代,由于公司理财理论的发展促进了有效市场假说的诞生,从此,有效市场假说在会计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理论的产生促进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形成,其中Watts和Zimmerman是现代实证会计理论的集大成者。

Watts和Zimmerman针对以往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将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引入了会计研究,以契约成本为核心概念,构建了现代实证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建立在企业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的基础之上,其中,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看成是拥有不同要素的所有者为了获得各自的要素报酬,通过一组明示或默认的契约(譬如法律、合同、承诺、文化、习惯等)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利益混合体。契约的签订、履行、变更都会发生成本,这些就是所谓的契约成本;关于政府管制理论,经济学上的管制理论把政治活动界定为各利益集团为财富转移而展开的竞争。

在提出研究假设的过程中,Watts和Zimmerman认为:无论在企业的订约过程中,还是在决定政府对企业的活动进行管制的过程中,契约成本和信息成本均非零值。会计程序对上述两个过程的成本都有影响,因而也影响企业或企业经理人员的现金流量。因此,如何选择会计程序取决于订约过程和政治

过程的现金流动结果。从这两个过程出发,实证研究从调查会计实务的实证理论的含义中发现三个带有规律性的会计程序选择,实证会计理论在对选择的会计程序进行抽象后提出了三个著名假设:补偿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政治成本假设。这三个实证性假设可能是由假设因素之外的因素造成的,尽管运用分红计划而进行的会计程序选择对报酬方案的影响更有效检验了与实证理论相一致的证据。但是,从债务契约和企业规模对会计程序选择影响的详细验证中,却获得较不一致的证据。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三大假设”获得了足够的证据,但它仍然有不足的方面。

甘道武认为:实证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在选择代理变量时,事实上隐含了两个假定前提:①代理变量能如实反映所代理的客观事实的内在联系;②代理变量的客观真实数据能够得到收集。回顾了“三大假设”产生的过程,我们对能否用我国企业会计程序选择资料来对假设进行检验持谨慎态度。不同的社会制度拥有不同的经济生活,同样,政府管制企业的政治过程也存在明显不同。如果拿西方学者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成本假设来检验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应考虑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下企业政治成本的形成过程,并进行相应的假设设计。

二、我国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及假设设计

首先,我们从代理理论入手,分析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下我国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事实上,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下的西方代理理论至少隐含这样一种假定条件:代理合约建立在自由选择和产权明晰化基础之上。在此条件下,西方代理理论重点研究如何设置一种能给代理人足够刺激和动力的机制或合约,使代理人在追求个人效用的同时实现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而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则具有特殊性:自下而上多层级代理,自上而下多层级委托。在多层级委托关系中,“全民”是第一级委托者,中央政府是第二级委托者,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是第三级委托者。在多层级代理关系中,企业经营者是第一级代理者,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是第二级代理者,中央政府是第三级代理者。全民财产是抽象的,类似于股份制企业的法人财产,但全民不同于股东,其初始委托对于任何所有者个人来说,都是“无财产委托”。代替全民行使财产委托权的中央政府,事实上拥有一切生产要素,它的委托是“有财产的委托”。基于中央与地方分权治理的体制结构,地方政府也拥有一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与中央政府一样,也是“有财产的委托”。

同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行政隶属关系,它的委托权实际上是对中央政府委托权的分解。基层代理者——由政府部门向企业委派的经营官员,严格地说只相当于企业内部“的“监工”,不具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这样的结果是:地方政府部门不仅代理行政,而且代理国有资产的部分控制权。这两种代理职能集于一身,形成了“政资不分”。地方政府部门与自己下派的企业经营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既是行政关系(包括对经理人员的任命、考核、升迁、调动以及收入分配),也是对国有资产经营权的委托代理关系,因而,形成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结果是企业产权不明晰、权

责不明确。政府强调国有企业的社会贡献,而忽视了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的组成部分应注重成本——效益原则这一事实。“政企不分”的结果是政府干预企业生产,企业失去对契约的自由选择权,企业行为表现为政府行为。

其次,我们来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政府管制问题。我们需要界定一下什么是管制,根据美国行政管理预算办公室的定义,管制就是政府机构根据法律制定并执行规章的行为,这些规章或者是一些标准,或者是一些命令。它关系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我们还要说明这些关于政治活动的管制理论采用的是自利观点,即假设政治家们将尽力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正是在这一假说下,才界定了政治活动是一种为财富转移而进行的竞争。经济学家们认为,政治家和官员们并不是被动的,实际上他们也给社会带来问题,政治家们天生是企业家。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他们并不是纯粹的中间人,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集团,所有政党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都有增加受控与政府的资源的动机,以此来增加他们的影响力。由于“政资不分”,我国的地方政府管制具有“职权独大”、“职权全能”的独特现象,政府官员们势必据此寻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根据寻租理论,我国企业也会产生对应的寻租行为,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寻租形成了企业的巨大的政治成本。面对政府的权威,企业经营必须“一只眼盯着政府”并“顺从权威”,而面对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扭亏的压力,政府对企业管理存在促使企业提高盈利的动机,吴东辉也通过分析我国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制度发现我国国有企业有增加会计盈利的现象。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我国政府管制企业的政治活动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管制企业的政治活动有很大不同,但政治活动确实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有影响,同时大规模企业比小企业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政治成本的表现不同体现在:西方学者认为企业最直接的财富转移方式是通过税收制度,而我国企业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得财富转移方式并不仅仅是通过税收,如政府作为一级委托人直接对企业收益进行分配获得投资收益。同时我国企业委托代理的层级较多且企业所有者“全民”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对经营者进行监督,这样势必造成“全民”及一级代理人监督激励不足、业绩评价手段单一等问题。因此规模假设应用于我国企业应作适当的修正,我们提出假设1:我国上市公司规模越大越倾向于使用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由于我国大规模企业多是由国家控股,由此我们引出假设2:国有控股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

三、实证研究设计

1.数据收集。我们以存货中原材料和产成品发出计价方法、存货中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两项会计政策的选择为研究对象,以2003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2003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共有1 287家,抛去ST公司和未获得数据的公司,我们共获得了1 095个观测值。2003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执行两项会计政策的数据来自于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研究所需其他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

2.研究变量设计。因变量:我们把两项会计政策使用的不同组合作为因变量。我们假设每项会计政策均有两种选择:增

加当期盈利或者减少当期盈利,同时认定两项会计政策对报告盈利的影响程度相同。Hagerman和Zmijewski验证了对盈利影响程度的不同,假设其演算结果基本一致,则会计政策组合分为三种。盈利减少和盈利增加的两个极端组合分别当作“0”和“2”。只有一个增加盈利的会计政策的所有组合用“1”表示。详细分组见表1。

表1

组合	潜在的备选会计方法			会计政策选择策略		
	原材料和产成品等发出计价方法	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	策略变量	次数	百分比(%)	
使盈利降至最低	1	0	0	813	74.25	
	2	1	0	248	22.65	
	3	0	1			
使盈利增值最大	4	1	1	2	34	3.1
共计				1 095	100	

注:

会计方法	1:增加盈利的方法	0:减少盈利的方法
存货中原材料和产成品等发出计价方法	先进先出法	加权平均法
存货中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	五五摊销	一次摊销

策略变量取值: 当公司未选用任何一项增加盈利会计政策时取值为0, 当公司选用一项增加盈利会计政策时取值为1, 当公司选用两项增加盈利会计政策时取值为2。

自变量: 我们观测的是政治活动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所以我们使用的自变量仅包括政治成本的替代变量, 我们采用的替代变量如下:

(1) 企业规模。据前文的分析, 我们假设我国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增加当期盈利。

(2) 国有经济控股。有学者认为: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国有企业的定位与西方发达国家是不一致的, 与一般的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主体定位也是不一致的。宏观经济效率应当是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在强调宏观效果的前提下, 高盈利的国有控股企业会使得社会更加稳定。根据假设, 国有控股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当期盈利。

(3) 行业特征。西方理论研究者也认为: 除了企业规模外, 其他因素(如行业)也影响着政治成本, 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我国垄断行业大多出现在第一、第二产业, 属于第三产业的企业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 具有试图利用盈余的增加获取更多的社会资金支持的动机, 因此我们假定归属第三产业的我国企业倾向于增加当期利润, 归属其他产业的倾向于减少当期利润。

其他西方实证研究者考虑的政治成本的替代变量, 如企业风险和资本密集化程度等, 经过检验证实这些变量的特征并不显著, 所以我们采用前述三项作为解释变量。

3. 研究方法。我们借鉴Zmijewski和Hagerman的回归分析模型对决定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政治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以上述可能影响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各个因素为解释变量, 以会计政策选择组合为被解释变量, 建立如下分析模型:

策略I(AC)=c₀+c₁×企业规模(GM)+c₂×国有经济控股(KG)+c₃×行业特征(HY)

I=1, 2, 3, ..., 个企业

其中: 因变量“策略I”相应于各个组和对盈利的影响, 分

别取0到2, “2”表示形成最大盈利的组合。

企业规模变量(GM), 根据惯例, 我们采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代表企业的规模。

国有经济控股变量(KG), 按国家统计局有关规定, 国有经济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 国家资本(股本)占较高比例, 并且由国家实际控制的企业。“国有控股”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国有绝对控股”; 另一类是“国有相对控股(含协议控制)”。按这个要求我们简化为当国有资本是企业的第一股东时取1, 否则取0。

行业特征变量(HY), 企业归属行业按国家统计局有关规定, 当企业属于第三产业时取1, 否则取0。

具体企业归属产业解释如下: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等。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等。

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本模型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四、实证结果及结论

1. 上市公司政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上市公司政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容量	均值	标准差	总和	最小值	最大值
GM	1 095	20.07	0.0001	21 975.68	0.02	4 171.2
KG	1 095	0.7	0.035	816	0	1
HY	1 095	0.25	0.035	217	0	1

注:

①企业规模变量(GM), 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表示。

②国有经济控股变量(KG), 当国有资本是企业的第一股东时取1, 否则取0。

③行业特征变量(HY), 当企业属于第三产业时取1, 否则取0。

根据表2, 我们可以看出: ①我国企业规模较小, 2003年的上市公司平均规模达到20.07亿的销售规模, 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经济实力。1 095家上市企业中, 销售规模最小的只有区区200万元, 规模最大的企业是中国石化, 销售额达到了4 171.2亿元, 但我国上市企业中规模达到千亿元以上的只有中国石化一家, 这同时说明我国的经济水平较落后, 缺乏大规模的企业。②我国上市公司中有70%是国家控股的企业, 这些企业中有很多是由政府直接领导, 政府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 从而使得企业活动部分表现为政府行为。

2. 卡方(x²)检验。我们利用表格分析考察所选取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关于规模变量与会计策略变量的独立性卡方检验, 见表3-1:

表3-1

会计政策组合策略变量	规模分类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合计
0	567(559.82)	246(253.18)	813
1	165(170.77)	83(77.23)	248
2	22(23.41)	12(10.59)	34
合计	754	341	1 095

注: 表3-1中圆括号中的数是E(n_{ij})。

为便于进行卡方统计检验,我们对规模变量进行了一定的改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我们简化规模变量为:当企业销售额超过人民币3亿元为大型企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计算 χ^2 统计量,得 $\chi^2=1.19$ 。

给定 $\alpha=0.05$,由于 $\chi^2=1.19 < \chi^2_{0.05}(2)=5.991$ 。因此我们发现显著性水平0.05下,我国企业规模大小与会计政策组合无关。关于国有控股变量与会计策略变量的独立性卡方检验,见表3-2:

表3-2

会计政策组合策略变量	国有经济控股分类		合 计
	国有控股	非国有控股	
0	611(605.85)	202(207.15)	813
1	178(184.81)	70(63.19)	248
2	27(25.34)	7(8.66)	34
合 计	816	279	1 095

注:表3-2中圆括号中的数是 $\hat{E}(n_{ij})$ 。

计算 χ^2 统计量,得 $\chi^2=1.59$ 。

给定 $\alpha=0.05$,由于 $\chi^2=1.59 < \chi^2_{0.05}(2)=5.991$ 。因此我们发现显著性水平0.05下,不能认为我国企业国有经济控股与会计政策组合选择有关。

关于行业变量与会计策略变量的独立性卡方检验,见表3-3:

表3-3

会计政策组合策略变量	行业特征分类		合 计
	第三产业	其他产业	
0	149(201.21)	664(611.79)	813
1	96(61.38)	152(186.22)	248
2	26(8.41)	8(25.59)	34
合 计	271	824	1 095

注:表3-3中圆括号中的数是 $\hat{E}(n_{ij})$ 。

计算 χ^2 统计量,得 $\chi^2=92.79$ 。

给定 $\alpha=0.05$,由于 $\chi^2=92.79 > \chi^2_{0.05}(2)=10.579$ 。故即使在0.005显著水平上也可否定零假设,即认为会计政策组合与行业分类具有显著相关性。

3.回归分析。表4是Logistic回归分析

表4

变量	符号预测	系数总计	P值(t统计量)
GM	+	-0.000 12	-0.315 1(-0.424 7)
KG	+	0.009	0.7976(0.2566)
HY	+	0.341 7	0.0000+++ (9.7870)

注:

①表4中企业规模变量(GM),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表示。

②国有经济控股变量(KG),当国有资本是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时取1,否则取0。

③行业特征变量(HY),当企业属于第三产业时取1,否则取0。

④+、++和+++分别表示检验在10%、5%和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双尾检验)。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①根据回归分析,发现我们的第一假设并不成立,这同我们做的独立检验是一致的,只是从系数符号来看我国企业倾向于西方的规模假设,但是如同王跃堂在2000年的研究一样,其系数从统计角度看并不具有显著性,可以看出经过几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我国企业依然没有形成同西方企业趋于一致的规模假设,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起到明显的经济效果。我国上市公司规模与会计政策选择没有明显的关系,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②国有控股特征也不显著,结合独立检验可以看出我国企业中国有经济控股企业与会计政策选择没有明显的关系,只是从系数符号来看,我国企业中国有经济控股企业有增加当期盈利的迹象。③行业特征呈现显著性,根据回归结果,属于第三产业的我国企业具有增加当期盈利的经济动机。但是由于我国归属第三产业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很少,这使得我国政府制定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受到很大影响。我国政府不仅要在制定会计准则上实现与国际接轨,同时更要在企业发展上下功夫。

本篇文章的局限在于:①线性模型对描述我国企业的关于政治活动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过于粗糙,这从模型的低拟合优度可以看出。②研究样本中的政治变量取值的确定中,由于资料有限及知识不足可能存在变量取值的偏差,以至于有可能影响模型的结果。③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组合变量选取带有一定的主观判断,由于我国上市企业中有部分企业采用了我们未纳入模型的会计程序,为便于我们对这些会计程序进行了归类,存货中关于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发出计价方法中,不同于先进先出法的会计程序都等同于采用加权平均法,这样可能会影响模型最后的分析结果,所以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主要参考文献

①王跃堂.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会计研究,2000;12
 ②石磊.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结构与制度改进.管理世界,1997;2
 ③刘元春.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5
 ④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会计研究,2004;10
 ⑤卫志民.政府管制与企业寻租.中外企业家,2005;3
 ⑥何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5;3
 ⑦吴东辉.中国上市公司应计项目选择的实证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1;3
 ⑧唐松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分析.会计研究,2000;3
 ⑨张先治.财务信息在契约中的作用.会计研究,2000;9
 ⑩甘道武.假定前提真实:会计实证研究的起点.会计研究,2004;12
 ⑪杨瑞龙.论国有经济中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管理世界,1997;1